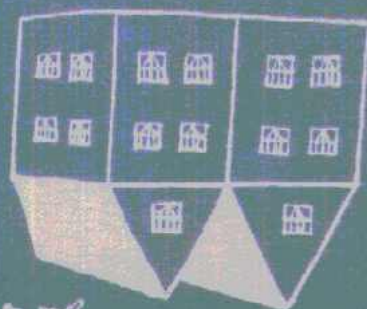


漫话漫画

李磊武自署



巧妙的设计

某杂志介绍国外
新建筑

1953年3月

工人出版社

漫遊漫話



漫画漫话

华君武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画漫话/华君武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9

ISBN 7-5008-2255-3

I. 漫… II. 华… III. 漫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658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外大街)
印 刷:	北京宏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90 千字
印 张:	7.75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13.80 元

前 言

我开始经常投稿漫画于报刊，应从1934年始，当时我还是个高中学生，思想尚未成熟。1938年我奔赴延安，经过文艺座谈的学习，逐渐认识漫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在漫画实践上追求大众化和民族化，迄今也将近六十年了，除创作外又写些和创作实践有关的短文章。近年在《讽刺与幽默》上开辟了一个《三言两语》的专栏，就一些中青年创作中的情况，说一些自己的看法。此外对一段历史的回忆，对一些师友追念，或对一些风气的嘲讽，偶也写些随感。无以名之，两者相加就成了本书的题目《漫画漫话》。

此书的编写过程中，多亏老伴宋琦和郑化改、崔自默同志的帮助，一并在内表示感谢。

华君武

一九九九年六月芒种

近代上海是我正反两方面的教员

六十三年前，我带着铺盖，穿了一身蓝布长衫到了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我的算术很糟，在小学学算术四则运算，“鸡兔同笼”就卡住了。在旧社会，没钱不能上美术学校；学了美术也不能养家糊口。我早年丧父，家道中落，母亲一定让我学理工。因为远亲关系，进了大同可免学费，没有数理化的脑子进了以数学著称的大同，其后果可想而知。我只记得，数学老师吴在渊上课，因为听不懂，他讲他的，我画我的漫画。吴先生评分特别，成绩不好，别的课最多打零分，他可以给负分，我的总平均分数就被他的负分拉下来了。直到现在，我还是谈“数”色变。但是，我因为到了上海，才走进了漫画世界。

原在杭州上初中，我已经热心于漫画。但杭州没有漫画家，也没有漫画的刊物、没有交流，只是一个人在孤独摸索。此时到了上海，能看到那么多的报纸刊物刊登漫画，真令人目不暇接，欣喜若狂了。我向林语堂的《论语》投稿，首先跨进了他的编辑部，得识实际负责编务的绍兴人陶亢德。林语堂是大作家，上海几年我只见过两次，但从那里，我得识丰子恺先生，那时他大概也就四十来岁，没有丝毫架子，平易、谦虚。平常看子恺漫画，丰先生如在云端，现在竟在眼前，还和我这刚入漫画的青年娓娓而谈，使我更加敬重他。

《时代漫画》是鲁少飞主编的，编辑部在四马路（今福州路）。鲁少飞先生貌甚严肃，但对我们这些后学是很关心的，对我们的画稿中的问题常常不厌其烦来指点。我到今天还记得一次对我画稿（好像是《秋之野餐》）的意见，他的说话是一口使人难懂的上海南汇官话，又带点理论，加上我当时的水平，实在难懂。但他是一位老漫画家，我一个后生小子能得到如此的机会，对面而坐，实在是受宠若惊，只能不住点头，不懂装懂了。张光宇先生是一位好人，艺术修养好，待人谦和，他的艺术有极强烈的民间传统，又有现代的风格，作品富有装饰性，他设计的一套具有现代化的民间格调的朱漆家具，好看极了。张正宇先生则对我们的作品常常热情赞扬，我当时漫画喜画人物多的大场面，他就用惊叹的声调连呼“伟大”，这种鼓励常常使我惊喜交加。叶浅予当时的漫画，在社会上影响和声誉是最大的，他是职业漫画家，社会活动也多，因此见他的机会就不如其他老前辈多了，但在言谈中感到他还是在关心着我们。他们都是我走向漫画的引路人。

在上海还可以看到外国报纸和书刊刊载的漫画，有专门出售这些书刊的外国书店，南京路就有一家别发书店。若照今天商界迷信来说，自称“别发”实在是不可思议了。我当时只能讲点洋泾浜英语，但看漫画有时连猜带蒙也能知其大概。装做买书的样子浏览一番，对我开阔眼界大有帮助。我当时受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白俄漫画家萨巴乔（原名为萨巴乔诺夫）的作品影响，连签名都学他，现在想来不免脸红，但当时还沾沾自喜呢。

在上海几年，我认识了胡考、张乐平、黄苗子、陆志庠、汪子美、特伟、丁聪（其中特伟、丁聪和我都在上学）。黄嘉音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他和林语堂是同乡，两家似有世谊，他



1936 年华君武（右二）在上海与丁聪（左一）、
黄尧（左二）、黄苗子（右一）合影

也帮助林语堂办《西风》杂志，带我上愚园路林家见林语堂的就是他。他的漫画上有一标志，即一只小鸟。1938 年，我去延安前曾和他商量，他极表赞成并帮助了我一笔为数不小的路费，并送我上了去香港的轮船。我也请他回去安慰我的母亲，因为我没有告诉她老人家。解放以后，黄嘉音被错划为“右派”，惨死在宁夏固原。

我从小小时起，现实使我受到爱国的教育。我们跟着老

师到杭州西湖边的日本领事馆喊“反对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口号，曾在大街上张贴抵制日货的标语。“九·一八”事变后，我们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自发成立了义勇童子军。到了上海，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认识更具体化了：公共租界巡捕“红头阿三”（头缠红布的印度人）、法租界安南巡捕、虹口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日本浪人，可以随便寻衅、随意“抄靶子”（搜身）、随便打人。但公共租界却有一条可笑的法律：谁在路上倒拎着鸡鸭就犯虐待动物的罪名；大讲其“鸡道主义”。

我在上海上学三年，当银行小职员两年，我还不可能看到社会黑暗的深处，但世态的炎凉、吃施粥的贫民、高等华人的嘴脸、西崽洋奴的卑劣、达官贵人的无耻，已使我这个青年人感到社会之不公、国家之危急、个人前途之渺茫。近代上海对我起了正反两种教员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使我下决心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我的错误

1933年到1936年，我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高中上学。我从小学时算术就不好，记得学“四则”时，鸡兔同笼我就弄不清；但我家里硬要我学理科，硬把我送进当时以数学闻名的大同大学附中。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吴在渊先生，50年代我还和华罗庚同志谈过他。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每次上课不翻课本就开讲，功课好的同学还能跟上，我的数学本来就差，跟也跟不上，越学越糟，我就索性不听课了。那时我已经在社会上投稿漫画，所以算术课本的空隙里都成了我画小人儿的地方。吴在渊先生考试评分也很特别，别的先生评分是六十分及格，最多吃零分，吴先生不是这样，最坏的可评负几十分，我的数学就评过负分，因此在大考后总评分被负分平均，成绩就很“可观”了。我很怕吴先生，敢怒而不敢言。吴先生有一位助教施先生，年纪轻些，我们一些数学不好的学生就对他不很尊敬，有时课堂秩序也不很好。约在1935年秋季，我在课堂上画了一张施先生的漫画像，内容是很不恭敬的。我画好后本想给我附近的一位表弟“欣赏”，没有想到他看后就送到施先生的讲台上（这也是他不敬重施先生的表现），这下惹下大祸，施先生顿时离开了课堂，不来上课了。后来学校公布了记我大过两个的处分（当时三个大过就是开除），等到毕业时就通

知“不再升入大学”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施先生。

这件事咎由自取，时隔六十年又无机会向施先生道歉；借母校征文的机会，向施先生赔礼并表示我的歉意。

1942年毛主席和我们的谈话

1942年年初，在延安我和蔡若虹、张谔三人合办一个《讽刺画展》^①，地点是在军人俱乐部新建的砖窑里。当时在延安开画展并不多，漫画又是群众爱看的，因此引来了很多观众，也可算是一种轰动。过了几天，毛主席突然带了几个同志来看这个展览，我这时正在值班，就由我陪着毛主席看。主席看得很仔细，也问了一些问题，多半是因画面或主题思想表现不明确。当时我作了一些解说，因为年代久远，已记不清毛主席问了哪些话。看完后，我送毛主席出门，按当时延安的习惯请毛主席批评，毛主席说了“漫画要发展的”；当时我还不理解这句话的涵义，又未敢再问。

大约时隔半年之后，约在夏秋之间，当时在延安《解放日报》负责副刊编辑的东北作家舒群通知我们，毛主席约我们三个人去见见面。那天下午我们如约，由舒群陪着到了枣园毛主席住处。我们和毛主席见面和谈话，就在园子里的一棵大树下，那里放着一张方桌，几把椅子，后来吃饭也在那里。因为时隔已有五十多年，很多细节已经忘掉。我们是下午去的，吃了饭，天气已近黄昏，当时谁也没有手表，估计大约有两个半小时左右。

我迄今记得最清楚的是毛主席关于漫画的一段谈话，大概毛主席看到我在《解放日报》上画了一幅批评植树不养树

的漫画，延河边上矗立着一根无枝叶的细树杆。毛主席说，不好好植树应当批评，但是延河那一段植树不好应该注明，如果王家坪（当时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植树不好就应该注明王家坪，延河很长，否则就变成整条延河两岸植树都不好了。由此毛主席就讲了个别和一般、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因此这段谈话在以后几十年我们漫画创作中克服片面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当时还说，可不可以同时画两幅漫画，一幅是表扬正确的，另一幅是批评错误的。我因觉得这种表现方法比较呆板，所以很少采用。

毛主席是一位伟大人物，我们都很景仰他。除了我几个月以前在《讽刺画展》时见过毛主席，平时都是在大会上较远地见到他。现在坐在毛主席身旁，自不免有些拘束，但他很快就打破了这种拘束感，使人很自然地讲话。我记得开始毛主席问到蔡若虹的籍贯，知道是江西人时，毛主席就问蔡若虹，知道不知道江西有位大名鼎鼎的道教头头张天师，蔡若虹说不出张天师的来历，毛主席就讲了一段关于张天师的笑话，使得我们什么话都敢说了。



1939年所植的树林

我在吃饭时看到桌上有碟生煊青辣椒加盐，就问外边传说毛主席连吃西瓜都就辣椒有无此事，毛主席也笑着说那是在长征已到甘肃某一个村上，休息吃饭，桌上也有辣椒，正吃着，送来切好的西瓜，又吃了西瓜，大概就是这样传开去了。

我也问了毛主席一个严肃的问题，我说我参加抗日，要我去打仗，我敢冲上去，但是如果被敌人抓住，对我用酷刑我怎么办，毛主席说你要想到为人民。我记得我们向主席告别时，他送我们到院门口，又对我重复了这句话。

[注]

①关于1942年的《讽刺画展》，我后来逐渐认识到，由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许多漫画没有后来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中所论述的对敌友我三种不同态度的讽刺，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也不是与人为善的；当时又是民族矛盾处于严重关头，举办这种展览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从教堂引起的回忆

从罗雪村同志处看到了他的延安之行的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旧址写生，其中之一是桥儿沟的一座天主教堂，引起了我许多往事回忆。就说这一座教堂，当1940年我们迁入以后，毛主席、朱老总、周恩来都曾来过。毛主席在这里跳过交际舞，他的舞姿是很独特的，有点像中国人踱方步；而周恩来是很高雅地道的交际舞。教堂里还演过《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也演过果戈理、契诃夫的戏剧。

教堂两侧有两排石窑洞，中间有一块空地，也可打篮球。毛主席曾在这里对鲁艺师生讲过话，号召大家到群众中去，提出了“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平时周扬同志作全校性的报告也在这里进行。最引人的是周立波的《文学讲座》，很多学生为他讲解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安娜·卡列尼娜》所倾倒。1942年这里也开过审干的大会，被康生的“特务如麻”所歪曲的坦白运动。诗人李又然说了“我看到的康生，他的眼睛都是发绿的”，遭到大会斗争，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当时只有逼供，还没有发明“喷气式”而已。

大家自带小板凳在这里开了许多内容的会议，也可说是一种户外课堂。印象很深的是地上的跳蚤太多，开会时“千军万马”都钻到裤腿里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第一次请了老百姓组成的腰鼓队在这里表演，从此鲁艺走出了

“小鲁艺”，到生活、群众中去了，产生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等好作品。

在篮球场两侧，有一排平房。约在1944年狂飚社的高长虹老先生，只身步行从山西来到鲁艺，找到周扬。他性情孤僻，周扬就安排他住在美术系，嘱我在生活上照顾他。我记得他只和从苏联回来的美术史家胡蛮偶有来往，有时还夹有争吵的声音。

教堂的西南侧，还有一块排球场，美术系只有木刻家力群和我去打球，自称校队。延安生活是艰苦的，但比前方还好些。我们当时大多是青年，不怕艰苦，精神乐观。在鲁艺学习，提高了政治思想，确定了艺术方向，学会种地、纺线，还学会了跳舞、溜冰（冰刀是用捡到的日本轰炸延安的炸弹皮打的）和游泳。

日本投降了，学院组成了东北文工团。东北作家舒群带领着我们奔赴前方，8月我们在这座教堂前拍了照片，离开了延安。

这就是这座教堂的周围，它引起了美好的回忆。

一九九八年

追忆漫画《抢面条》

今年6月，在西安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延安老友、版画家刘梦天。他还记得1939年我在鲁艺墙报上的一幅漫画《抢面条》。面条要抢，当属美食；这还要从1938年我从上海奔赴延安说起。那时到了成都，又从成都往西，翻过秦岭北面，山下有个小城叫宁羌（今改宁强），这是我第一次跨过长江到了西北。下车只有一个小饭铺，只卖面片，也没有菜，只有

